

第六章

魯迅思想與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一、「新的五四運動」與台灣文化重建

1. 許壽裳與魯迅

前文已指出戰後初期台灣文化重建過程中，台灣省編譯館扮演的重要角色，及作為長官公署外圍團體的台灣文化協進會的重要功能。在這段期間，許壽裳除了擔任編譯館館長外，對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文化活動也發揮了影響力。本章將進一步討論支持許壽裳從事台灣文化重建活動的思想基礎，以及台灣的知識分子與國府對此思想基礎的反應如何。

為了徹底檢討許壽裳在台之文化重建活動的思想基礎，本文會將許壽裳在台時期的重要著作、講演活動列為表一，關於魯迅之著述活動列為表二。

從表一能夠得知許壽裳在台期間，五回的演講中有兩回是關於魯迅，37篇的著作中有16篇是關於魯迅的，由此可知魯迅的研究及其思想的傳播介紹，可以說是許壽裳在台的演講與著作活動的中心。

表一 許壽裳台灣時期主要著作及講演活動

1946.6.25	(抵達台北)
8.?	撰〈台灣省編譯館的設立〉(《現代週刊》2卷11期[1946.9.3])
8.23	撰〈孔子的生平事略及其學說〉(《現代週刊》2卷12期[1946.9.10])
9.5	在台灣省地方幹部訓練團演講〈台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的展望〉(《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團刊》2卷4期[1946.10.15])
12	撰〈俞曲園先生的教育功績〉
23	在省立第一女子中學演講〈第二誕生期和第三誕生期〉、《亡友魯迅印象記》完成第8、9章
26	《亡友魯迅印象記》完成第10章
30	撰〈魯迅的精神〉(《台灣文化》1卷2期[1946.11])
10.?	撰〈魯迅的德行〉(上海《僑聲報》，1946.10.14；台中《和平日報》，1946.10.21)
6	《亡友魯迅印象記》完成第11、12章
14	撰〈魯迅和青年〉(台灣《和平日報》，1946.10.19)
15	《亡友魯迅印象記》完成第13、14章
19	撰〈台灣省編譯事業的拓荒工作〉(《台灣月刊》)3、4期合併號[1947.1])
29	撰〈魯迅的人格和思想〉(《台灣文化》2卷1期[1947.1])
?	撰〈新台灣與三民主義的教育〉
11.25	撰《亡友魯迅印象記》
26	撰《亡友魯迅印象記》
30	在省立師範學院演講〈魯迅的人格及其思想〉
1947.1.2	撰〈教授國文應注意的幾件事〉(《中等教育研究》創刊號[1947.4])
1.?	撰〈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兩位成功的開國元勳〉(《文化交流》1輯[1947.1])
2.13	撰〈摹擬與創作〉(《台灣文化》2卷7期[1947.10])
18	在台灣省地方幹部訓練團演講〈教授國文應注意的幾件事〉

19	撰〈第二誕生期和第三誕生期——告台灣省青年〉
3.22	《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脫稿（台北：台灣書店，1947.4）
26	題臺靜農藏〈魯迅講演稿手跡——娜拉走後怎樣〉
4.30	撰〈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新生報》，1947.5.4）
5.4	撰《〈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序》（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1947.6）
26	撰《亡友魯迅印象記》脫稿（上海·峨嵋，1947.10）
6.3	撰台灣大學編《〈敦煌祕籍留真新編〉序》（《台灣文化》2卷6期 [1947.9]）
5	撰〈俞曲園先生的思想〉（《台灣文化》2卷4期 [1947.7]）
7.28	撰〈魯迅的避難生活〉（《時與文》2卷6期 [1947.10]）
8.1	撰〈中國民族精神的中心〉（台灣《和平日報》1947.8.3）；〈魯迅和我的交誼〉（《台灣文化》2卷5期 [1947.8]）
8.?	撰〈讀了《敦煌祕籍留真新編》之後〉（《學藝雜誌》17卷9號 [刊行日期不詳]）
9.30	撰〈魯迅的遊戲文章〉（《台灣文化》2卷8期 [1947.11]）
12.5	在台北市外勤記者進修會演講〈中國新文藝創造者魯迅〉（徐子記錄，題〈許壽裳話魯迅〉，《中華日報·中華週報》20號 [1947.12.8]）
13	撰〈王通和韓愈〉（《台灣文化》3卷1期 [1948.1]）
20	撰〈新年展望和 [台灣大學] 校歌歌詞〉（《國立台灣大學校刊》7期 [刊行日期不詳]）
21	撰〈對於本省今後語文教育的一點意見〉；〈三百年前台灣破荒的偉人沈光文〉
1948.1.21	《敦煌祕籍留真新編研究——尚書盤庚·微子二篇》脫稿
29	撰〈李慈銘秋夢樂府本事考〉（《台灣文化》3卷4期 [1948.5]）

參考文獻：《許壽裳日記：自1940年8月1日至1948年2月18日》（北岡正子、黃英哲、秦賢次編 [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1993]）；許世瑛，〈先君許壽裳年譜〉，收入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卷22（北京：中國文聯，1989）；許壽裳未公開著作。

表二 許壽裳的魯迅關係著作一覽表

凡例……A =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B = 《我所認識的魯迅》1952年、1953年、1978年。C = 《亡友魯迅印象記》。未見 = 原載雜誌(書)未見者。不明 = 原載雜誌(書)完全不明者，及無法判定其是原載或是轉載者。

原載雜誌之發行年月日，明確者，則予以記載，無法確認者，則不予以記載。

年月日	題目	初刊雜誌	收入書
1936.10.19	〈魯迅去逝〉		
10.27	〈我所認識的魯迅〉	《新苗》(北平) 11期 (1936.11)	B—1952年、1953年、1978年；《魯迅先生紀念集：評論與記載》(上海：文化生活，1937.10)
11.8	〈懷亡友魯迅〉	《新苗》(北平) 11期 (1936.11)	A、B—1952年、1953年、1978年；《魯迅先生紀念集》；《月報》(上海：開明書店，1937.1) —未見
12.17	〈魯迅的生活〉	《新苗》13至14期 (1937.1-1937.2)	《工作與學習叢刊之一·二三事》(上海：生活書店，1937)；A、蕭紅，《回憶魯迅先生》(重慶：婦女生活社，1941)；B—1978年
12.19	〈懷舊〉	《新苗》13期(1937.1) —[只有目錄，未見本文]	B—1952年、1953年、1978年；《魯迅先生紀念集》
1937.3.18	〈魯迅古詩文的一斑〉	《新苗》16期(1937.4)	《許壽裳文錄》(長沙：湖南人民，1986.9)

5.?	"Lu Hsun's Life and Character" (by Hsu show Shang and Sheh Quincy)	《新苗》17期	沒有
5.24	〈魯迅先生年譜〉	《大魯迅全集》卷7（東京：改造社，1937.6）； 《魯迅先生紀念集》	《宇宙風乙刊》27期（1940.8）；王冶秋， 《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上海：峨嵋，1947.9）
1942.3.12	〈魯迅在杭州任教時的生活〉	不明	不明
4.14	王冶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序〉	王冶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上海：峨嵋，1947.9）	A、B—1952年、1953年、1978年
7.8	〈周樹人略傳〉	教育部《中國教育全書》—未見	沒有
10.17	〈關於兄弟〉	《文壇》（重慶）2卷1期（1943.4）—未見	A、B—1952年、1953年、1978年
1944.5.4	柳非杞編，〈《魯迅舊體詩集》序·跋〉	《新華日報》（重慶），1944.5.4（題名〈《魯迅詩集》序〉）—未見； 《雲南晚報》（昆明），1944.7.30（題名〈跋尹默手寫《魯迅先生詩鈔》〉）—未見	A、B—1952年、1953年、1978年
10.18	〈回憶魯迅〉	《新華日報》（重慶），1944.10.25—未見	B—1952年、1953年、1978年
1945.10.15	〈魯迅的幾封信〉	《新華日報》，1945.10.19—未見	B—1953年、1978年
10.18	〈魯迅與民族性研究〉	《民主週刊》（昆明）1卷2期（1946.1.15）—未見	B—1952年、1953年、1978年

1946.5.18	《亡友魯迅印象記》 (起稿三則)	1至2章刊載於《民主週刊》35期；3章刊載於《民主週刊》36期	C
5.24	《亡友魯迅印象記》 (10頁寄給許廣平)	4至5章刊載於《民主週刊》37期	C
6.8	《亡友魯迅印象記》 (11頁寄給許廣平)	6至7章刊載於《民主週刊》38期	C
6.25	(許壽裳抵達台北)		
9.23	《亡友魯迅印象記》 (8至9章寄給許廣平)	8至9章刊載於《民主週刊》51、52期併號及《人世間》4期(1947.6.12)	C
9.26	《亡友魯迅印象記》 (10章寄給許廣平)	《人世間》4期(1947.6.12)	C
9.30	《魯迅的精神》	《台灣文化》(台北)1卷2期(1946.11)	A、B—1952年、1953年、1978年
10.?	《魯迅的德行》	《僑聲報》(上海), 1946.10.14; 《和平日報》(台中), 1946.10.21	A、B—1978年
10.6	《亡友魯迅印象記》 (11至12章寄給許廣平)	11章刊載於《人世間》4期(1947.6.12), 12章刊載於《人世間》5期(1947.7.20)	C
10.14	《魯迅和青年》	《和平日報》(台中), 1946.10.19	A、B—1953年、1978年
10.15	《亡友魯迅印象記》 (13至14章寄給許廣平)	13至14章刊載於《人世間》5期(1947.7.20)	C
10.29	《魯迅的人格和思想》	《台灣文化》2卷1期(1947.1)	A、B—1952年、1953年、1978年
12.25	《亡友魯迅印象記》		C

12.26	《亡友魯迅印象記》		C
1947.3.26	〈臺靜農藏《魯迅講演稿手跡：娜拉走後怎樣》跋〉	沒有	沒有
5.4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序》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1947.6)	A、B—1978年
5.26	《亡友魯迅印象記》(脫稿15至25章寄給許廣平)	15、16至17章刊載於《人世間》6期(1947.8.20)；18、19至20章刊載於《人世間》2卷2期(1947.10.1)；23章刊載於《台灣文化》2卷5期(1947.8)	C
6.?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出版		
7.28	《魯迅的避難生活》	《時與文》(上海)2卷6期(1947.10.17)	B—1952年、1953年、1978年
9.30	《魯迅的遊戲文章》	《台灣文化》2卷8期(1947.11)；《文藝復興》4卷2期(1947.11.1)	B
10.19	《亡友魯迅印象記》出版		
1948.2.18	(許壽裳在國立台灣大學宿舍遇害)		
1952.6.-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一版出版		
1953.4.-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二版出版		
1978.6.-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三版出版		

參考文獻：《許壽裳日記》；許世瑛，〈先君許壽裳年譜〉，收入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卷22（北京：中國文聯，1989）；許壽裳，《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1947），《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峨嵋，1947），《我所認識的魯迅》（北京：人民文學，1952），王冶秋，《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上海：新文藝，1956）；沈鵬年輯，《魯迅研究資料編目》（上海：上海文藝，1958）；林辰編，《許壽裳文錄》（長沙：湖南人民，1986）、魯迅紀念委員會編，《魯迅紀念集》（上海：文化生活，1936）；袁良駿，《魯迅研究史》上卷（西安：陝西人民，1986）；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北京：人民文學，1953；1978）、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1-5（北京：中國文聯，1985-1990）；北岡正子、黃英哲，〈《許壽裳日記》解說〉，收入北岡正子、黃英哲、秦賢次編，《許壽裳日記》；北岡正子、黃英哲，〈關於《許壽裳日記》〉，《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8期（1994.9）；北岡正子，〈《我所認識的魯迅》に異義あり〉，《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17號（1996）。

眾所皆知的是，許壽裳關於魯迅的著述在今天已成為魯迅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從以上的表二能夠得知其大部分是在台灣完成的。許壽裳關於魯迅的著述被整理為單行本出版的有三種，《魯迅的思想與生活》（楊雲萍編 [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1947]）、《我所認識的魯迅》（王士菁編 [北京：人民文學，1952]）、《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峨嵋，1947）。前兩者是將各處發表過的單篇文章整理成書，同標題目的文章互相重複的不少，但是字句的表現有部分是不同的。尤其是許壽裳去世後出版的《我所認識的魯迅》所收的若干文章，不知是何原因內容被做了更動¹。而《亡友魯迅印象記》是許壽裳受許廣平之託，來台

¹ 北岡正子將《魯迅的思想與生活》、《我所認識的魯迅》、《亡友魯迅印象記》三本書的文章做了對照，指出其異同。詳細請參考北岡正子，〈《我所認識的魯迅》に異義あり〉，《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17號（1996）。

赴任之前即開始撰寫，依據各章分成數回撰寫，總共25章，這是當時在上海的許廣平之奔走下，得以成為單行本出版。此外，還有數篇文章並未收入在上述單行本裡。

從表二能夠得知許壽裳赴台灣之後，兩年不到的時間之著述遠勝於之前的十年，《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的一半內容、《我所認識的魯迅》的三分之一內容、《亡友魯迅印象記》的三分之二內容是在台灣寫成的。許壽裳在台灣如此的積極講演魯迅、書寫魯迅，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台灣文化重建的構想有密切關係。

許壽裳關於台灣文化重建的構想，在他親自撰述〈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一文中，充分表達出來。

誰都知道民國8年的五四運動是掃除我國數千年來的封建遺毒，創造一個提倡民主，發揚科學的文化運動，可說是我國現代史中最重要的劃時代、開新紀元的時期。雖則牠的目標，至今還沒有完全達到，可是我國的新生命從此誕生，新建設從此開始，牠的價值異常重大。我想我們台灣也需要有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揚科學，於五四時代的運動目標以外，還要提倡實踐道德，發揚民族主義。從這幾個要點看來，牠的價值和任務是要比從前那個運動更大，更艱巨，更迫切啊！²

因此可以理解許壽裳的台灣文化重建構想，即是在台灣掀起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宣揚民主、科學的五四中國新文化運動

² 許壽裳，〈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新生報》，1947年5月4日。

精神，以肅清日本文化影響。

其實，在許壽裳之前，行政長官公署也已認識到為了台灣文化重建，台灣需要展開類似「五四運動」的文化運動。當時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在題為〈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的電台廣播詞中，慨嘆「台灣一向沒有足與世界比美的文化運動，即如祖國『五四運動』一類的活動從沒有發生過，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文藝復興運動，更不消說了」³。當時行政長官公署的機關報《新生報》之社論〈論本省文化建設〉也指出「民主與科學，是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來，瀰漫內地的一種新文化精神。……但當這一劃時代的新生精神在內地激蕩，根本改造著古老文化，並發展成為一種以民主與科學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時，本省正處於日本統治之下，無從與之接觸而起同樣的變化」⁴。戰後初期，在台灣掀起類似「五四運動」的文化運動，進行台灣的文化重建，此一構想在行政長官公署內部可說有某種程度的共識，前面所論述的行政長官公署外圍團體——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文化活動即有此傾向，許壽裳的想法可以從當時這種思潮中來理解。

但是，許壽裳認為戰後台灣需要的不只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還要進一步提倡實踐道德，發揚中國民族主義，以建設一個具有新生命的台灣。至於如何在台灣掀起一個「新的五四運動」？許壽裳的構想是傳播魯迅思想，透過台灣省編譯館與台灣文化協進會之重要平台，將魯迅思想與台灣文化重

³ 宋斐如，〈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新生報》，1946年1月14日。

⁴ 《新生報》，1946年6月19日。

建做有機結合。

2. 許壽裳的魯迅思想傳播

許壽裳於1946年6月25日抵達台北，同年的10月19日恰是魯迅逝世十週年忌日，他在《和平日報》發表了〈魯迅和青年〉，這是他抵台後，發表的第一篇有關魯迅的文章，緊接著又在同月21日的《和平日報》發表了〈魯迅的德行〉，在隔月的11月1日發行的《台灣文化》（1卷2期）「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上，又發表了〈魯迅的精神〉。之後，又在隔年1月的《台灣文化》（2卷1期）發表了〈魯迅的人格和思想〉。

在上述文章中，許壽裳極力介紹魯迅的思想和精神的根本。例如在〈魯迅的精神〉一文中，對魯迅的精神做了概括性的總結，他說「抗戰到底是魯迅畢生的精神」「魯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話說，便是戰鬥精神，這是為大眾而戰，是有計畫的韌戰，一口咬住不放的」⁵。在〈魯迅的人格和思想〉一文中，指出魯迅是青年的導師、民族的文化鬥士，暴露了中國民族性的缺點，揭發了歷史的黑暗，其人格的偉大和聖潔在於其擁有真誠、摯愛、堅貞、勤勞，並強調魯迅的思想本質是人道主義，其方法是戰鬥的現實主義⁶。在〈魯迅的德行〉一文中，則再三闡述魯迅的德行特點是誠愛、勤勞、堅貞、謙虛⁷。此外，在〈魯迅和青年〉一文中一開頭就說：

⁵ 許壽裳，〈魯迅的精神〉，《台灣文化》1卷2期（1946年11月），頁2。

⁶ 許壽裳，〈魯迅的人格和思想〉，《台灣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頁1-3。

⁷ 許壽裳，〈魯迅的德行〉，《和平日報》，1946年10月21日。

魯迅是青年的導師，五四運動的驍將，中國新文藝的開山者。他的豐功偉績，到今日幾乎已經有口皆碑，不必多說了。但是他自己並不承認是青年的導師，正惟其如此，所以為青年們所信服，他的著述為青年們所愛誦。他說導師是無用的，要青年們自己聯合起來，向前邁進。……他又指示著青年生存的重點，生命的道路，而且主張國民性必須改革。……魯迅常說國民性必須改造，否則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口號雖新，革命必無成功。革命者只有前進，義無反顧的。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後記〉一文中說道：「歷史是過去的陳跡，國民性可改造於將來，在改革者的眼裡，以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于無物的」。以上這些話，至今還是很適切很需要的。⁸

從上述許壽裳的論述中，可以理解許壽裳想要傳達的信息是，戰後台灣最需要的是民主、科學、道德實踐、中國民族主義，這些精神可以集中從魯迅身上學習到。許壽裳明顯的意圖透過魯迅思想的傳播，使得過去魯迅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能夠再度在台灣掀起，達成台灣文化重建目的。

此外，許壽裳上述言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一抵達台灣之後，立刻透過魯迅思想的介紹，呼籲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性。國民性改造的必要，很久以前即是魯迅和許壽裳之間共同討論的課題。許壽裳在有關魯迅的回憶性文章中，屢屢提及二人在日本弘文學院就學期間，討論有關中國國民性的改造。當時，他們二人

⁸ 許壽裳，〈魯迅和青年〉，《和平日報》，1946年10月19日。

經常就這個問題，再三討論。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一致認為中國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缺乏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其最大最深的病根是兩次奴於異族，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⁹。關於中國國民性改造的問題，在許壽裳回國後，甚至在抗日戰爭期間，或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始終是他的終極關懷。例如從他1945年8月15日日記上所留下的兩首詩，就能窺其一端。

昨日詩兩首。8月10日夜聞日寇乞降，翌日得孀兒平安抵華府，喜成二首。

居然喜訊聯翩至，躡武倭夷竟乞降，
 難得八年催勁虜，從今一德建新邦。
 陷區妻子狂歌舞，盟國經綸足駿龐，
 歸路反愁何所見，創痍滿地下長江。
 兒書萬里慰親情，喜報安然抵美京，
 科學發明原子彈，和平領導國聯盟，
 厚生能泯貧和富，進德端由愛與誠，
 羨爾觀光時會好，相期無負此長征。¹⁰

即使在抗日戰爭勝利後，許壽裳仍然不忘昔日年少時代和魯迅之間的共識，中國國民性還是需要改造，重建戰後「新邦」，「愛

⁹ 詳細請參照北岡正子，〈もう一つの國民性論議——魯迅・許壽裳の國民性論議への波動——〉，《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10號（1989年3月）。

¹⁰ 《許壽裳日記》，頁186。

與誠」依然是需要的。這種信念與前面舉出的許壽裳戰後初期在台灣之言論之思想基調，基本上是一致的。對許壽裳而言，從日本異民族殖民統治掙脫後的台灣之文化重建與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國民性之改造，是密切相連的緊急課題。

總而言之，許壽裳在台灣極力傳播魯迅思想的意圖，除了深恐台灣和中國一樣會因奴於異族造成了國民性的扭曲，提醒台灣人明瞭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性外，更希望藉著魯迅思想的傳播，使魯迅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也能夠在台灣展開，藉以發揚中國民族主義，肅清日本文化影響，並引進民主、科學的新文化運動精神，達成台灣的文化重建目的。

二、台灣人的魯迅理解

在上一節已指出行政長官公署的台灣文化重建構想的動向中，含有許壽裳的藉由魯迅思想之傳播，在台灣掀起「新的五四運動」。以下本文將檢討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如何理解魯迅思想，並思考他們對當時台灣文化的見解。

魯迅思想在台灣傳播，有兩次高潮期，並不是始自許壽裳。第一次高潮期是在日據時期的一九二〇年代，台灣受到中國文學革命的影響也展開了新文學運動，除了提出各種文學主張與介紹文學理論之外，當時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民報》亦不時轉載了胡適、魯迅、郭沫若、周作人、謝冰心、徐志摩等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提供借鏡，其中以魯迅的作品（包括譯作）轉載最多，影響也最大¹¹。

楊雲萍在戰後曾對上述現象做了以下回想：

民國12、3年前後，本省雖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宰割下，也曾經掀起一次「啟蒙運動」的巨浪。面對此次運動，直接地，間接地影響最大的影響的，就是魯迅先生。他的創作如〈阿Q正傳〉等，早已被轉載在本省的雜誌上，他的各種批評，思想之類，沒有一篇不為當時的青年所愛讀。¹²

當時轉載魯迅作品的動機之一是因為「魯迅的譯筆又非常之老練，實在可為語體文的模範」。一般說來，當時台灣對魯迅的理解非常有限，還沒有完全捕捉到魯迅文學的真正核心¹³。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當局加強對台灣言論思想管制，廢止發行漢文新聞，一直到日本戰敗前，包括魯迅的一切中國新文學作品轉載幾乎不可能。雖然如此，一部分的台灣本地文化人還是透過日文翻譯本¹⁴，繼續閱讀魯迅，因此魯迅並沒有完全在台灣消失。至於台灣的魯迅思想傳播第二次高潮期，則必須要等到戰後了。

¹¹ 林瑞明，〈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魯迅與賴和〉，《國文天地》7卷4期（1991年9月），頁19-20。關於日據時期台灣轉載魯迅作品與有關於介紹魯迅的文章之詳細目錄，以及張我軍在一九二〇年代第一次魯迅思想傳播高潮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請參考中島利郎，〈日本殖民地下の台灣新文學と魯迅（上）——その受容の概観〉，《岐阜教育大學紀要》24集（1992）。

¹² 楊雲萍，〈紀念魯迅〉，《台灣文化》1卷2期（1946年11月），頁1。

¹³ 中島利郎，〈日本殖民地下の台灣新文學と魯迅（上）〉，頁227-28。

¹⁴ 魁蛙（蘇新）在〈也漫談台灣藝文壇〉（《台灣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中，曾做以下的回想：「本地的文化人……在日本統治時代，就已讀到一部日文《大魯迅全集》（按：東京：改造社，共7卷，1937.2-1937.8），只因本省被日政府隔絕祖國，致不能多得原著，而且因為受多年日本教育，致不能多讀一點原文」（頁14）。

戰後，台灣復歸中國。前面已指出行政長官公署採取的文化重建政策是企圖在台灣掀起一個「新五四運動」，儼然成為了一股社會潮流。在這種風潮下，五四中國新文學又大量被介紹到台灣，當時除了魯迅之外，還介紹了茅盾、郁達夫、沈從文、老舍、周作人、豐子愷、張天翼等人的作品。但是，沒有一個新文學作家能像魯迅那樣被大大的提起，做有系統的傳播介紹。

根據筆者的調查，從1945至49年間，在台灣出版的中日文對照魯迅作品單行本，就一共有下述五冊（按照出版年月先後）。之所以會做中日文對照，當然是為了對應當時的語言現象，

- 1947年1月 楊達譯，《阿Q正傳》，東華書局
- 1月 王禹農譯，《狂人日記》，標準國語通信學會
- 8月 藍明谷譯，《故鄉》，現代文學研究會
- 1948年1月 王禹農譯註，《拼音註解中日對譯 孔乙己 頭髮的故事》（第2輯）
- 1月 王禹農譯註，《拼音註解中日對譯 藥》（第3輯），東方出版社

此外，雜誌上也刊載（轉載）不少關於魯迅的傳記、回憶、作品介紹的文章。除了雜誌，當時台灣的三大報紙——《新生報》、《和平日報》、《中華日報》的副刊，關於魯迅的文章也近四十篇之多，作者有來自中國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而且在194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十週年忌日，三大報又不約而同地製作了紀念專輯。另外，官方編輯出版和民間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國語教科書也都採錄了魯迅的作品，如〈鴨的喜劇〉（初級中學適用《初級國語文選》[台北：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47]）、〈看戲〉

(一九四七年度台灣省各縣市小學教員暑期講習講義之二〈國文〉、〈鴨鴨的叫〉(節選〈鴨的喜劇〉,張我軍編,《國文自修講座》卷1[台北:聯合,1947])、〈美女蛇〉(節選〈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張我軍編,《國文自修講座》卷2[台北:聯合,1947])。因此,戰後初期可說是繼一九二〇年代之後的第二次魯迅思想傳播高潮期。

戰後初期,魯迅思想的主要傳播者,除了許壽裳之外,致力於傳播魯迅的台灣本地文化人,可以列舉三個人為代表,透過他們可以了解當時台灣本地文化人的魯迅思想理解。

(1) 龍瑛宗 (1911-1999)

龍瑛宗在日據時期即活躍於日本的中央文壇,1937年,日文小說《パイヤのある街》,曾入選著名綜合雜誌《改造》懸賞小說佳作,在小說中,龍瑛宗透過登場人物婉轉說出自己的心境,也透露了自己的讀書習慣。

佐藤春夫的魯迅的《故鄉》(按:指佐藤春夫翻譯的《故鄉》),深受感動,……舊有的觀念已分崩離析,不管再怎麼困苦,我還是只想讀書。我很想讀魯迅的《阿Q正傳》、高爾基的作品,還有摩根的《古代社會之研究》,託台北的友人,在舊書店尋購,可是並沒有找到,要買新書的話,又沒錢。……¹⁵

¹⁵ 龍瑛宗,《パイヤのある街》,《改造》19卷4期(1937年4月),頁52。



龍瑛宗攝於一九四〇年代後期
(龍瑛宗家屬提供)。

戰後初期最先介紹魯迅的台灣本地文化人即是龍瑛宗。1946年5月，龍瑛宗在他所主編的《中華日報》日文版¹⁶副刊上發表《阿Q正傳》，介紹魯迅作品，強調「魯迅生前極為憎惡中國的壞性格，但是不能因此就把魯迅視為非愛國者，正是因為他憎惡中國的壞性格，這才表示他是真正愛中國的」¹⁷。其後又在同年10月魯迅逝世十週年忌日，於《中華日報》日文版發表〈中國近代文學の始祖——魯迅逝世十週年記念日に際して〉一文，悼念魯迅，並指出「魯迅非常傾心露西亞的果戈里和高爾基，特別注意世界上的被壓迫文學」，「魯迅雖已逝世十年，魯迅的肉體雖已

¹⁶ 戰後初期，是適應過渡期，准許報紙、雜誌有日文版面，但是自1946年10月25日起即被廢止。

¹⁷ 龍瑛宗，《阿Q正傳》，《中華日報·文藝》，1946年5月20日，原文日文。

滅亡。但是魯迅精神還活著，那是永遠呼喚民族精神覺醒的聲音」¹⁸。

龍瑛宗透過自己的魯迅思想理解，強調魯迅精神長存，魯迅精神即是民族主義精神與國民性的改造，這是戰後台灣不可或缺的精神。

(2)楊遠 (1905-1985)

楊遠在日據時代即是甚為活躍的社會運動家和文學家，和龍瑛宗一樣也活躍於日本中央文壇，1934年，他的小說〈新聞配達夫〉曾入選文藝雜誌《文學評論》懸賞第二獎（第一名從缺）。戰後初期，更是活躍於台灣文化界，翻譯介紹了不少中國新文學作品¹⁹。在擔任《和平日報》副刊編輯時，刊載了許壽裳的〈魯迅和青年〉（1946年10月19日）、〈魯迅的德行〉（1946年10月21日），許廣平的〈忘記解〉（1946年10月20日），胡風的〈關於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1946年10月19日）等紀念魯迅的文章，積極介紹傳播魯迅思想。

1946年10月，魯迅逝世十週年忌日，楊遠同時在《中華日報》日文版與《和平日報》副刊發表新詩。兩者的題目均為「紀念魯迅」，只是使用不同的語言，內容幾乎一樣，都是讚美魯迅

¹⁸ 龍瑛宗，〈中國近代文學の始祖——魯迅逝世十週年記念日に際して〉，《中華日報·文藝》，1946年10月19日，原文日文。

¹⁹ 楊遠翻譯的中、日文對照中國新文學作品，計有《阿Q正傳》（魯迅原著，1947年1月）、《微雪的早晨》（郁達夫原著，1947年8月）、《大鼻子的故事》（茅盾原著，1947年11月）、《黃公俊的最後》（鄭振鐸原著，未見），皆是由東華書局出版，列入「中國文藝叢書」。



楊達攝於綠島監獄時期（照片出處：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卷10 [台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的戰鬥精神，強調「魯迅是人類精神的清道夫，迎向低劣及反動的東西，吶喊又吶喊，魯迅作獅子之奮迅」，「至今仍然到處能夠聽到魯迅的聲音，繼承者們的心中仍直視著魯迅的至誠與熱情。魯迅是人類精神的清道夫，是永遠長存的革命記號」²⁰。

但是最能夠表現楊達的魯迅思想理解，即是他寫在他所翻譯的中、日文對照《阿Q正傳》一書前之短文〈魯迅先生〉。在短文中，他說：

作為一位被迫害者與被壓迫階級的朋友，先生經常反覆的過著血肉模糊的戰鬥生活。……

《阿Q正傳》是先生的代表作，他向該詛咒的惡勢力與保守主義宣告死刑，但願每人仔細吟讀，只要惡勢力與保守主

²⁰ 楊達，〈魯迅を紀念して〉，《中華日報》，1946年10月19日，原文日文。

義不揚棄的一天，我們絕對無法前進。²¹

楊逵的魯迅思想理解如實的表現在上述的詩文中，對楊逵而言，魯迅是「永遠長存的革命記號」，是「被壓迫階級的朋友」，和反動勢力、保守主義戰鬥的不撓不屈之文學者。楊逵作為社會運動家，從日據時期活躍到戰後，他從社會運動家的立場，注意到魯迅戰鬥精神中所帶有的「社會性」與「政治性」。

(3)藍明谷 (1915-1951)

前文已述及，戰後初期，中、日文對照的魯迅作品翻譯單行本一共有五本出版，其中之一即是藍明谷的《故鄉》。

藍明谷本名藍益遠，「藍明谷」是筆名，另一筆名是藍青。1919年生於高雄岡山，台南師範學校畢業，之後前往中國北平的東亞經濟學院留學。北平時代和作家鍾理和相交相知。戰後返台，任職台灣省教育會，「二二八事件」前夕離職，經鍾理和介紹到其兄鍾浩東擔任校長的基隆中學任教，《故鄉》的翻譯就是在彼時完成的。1949年8月，國共鬥爭發展得如火如荼時，藍明谷和鍾浩東響應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祕密進行宣傳活動，被有關當局發現後遭到逮捕，即所謂「光明報事件」，鍾浩東及藍明谷其後均被判處死刑²²。前此，1949年4月6日，楊逵也因簽署

²¹ 楊逵譯，《阿Q正傳》（台北：東華，1947），頁2-3，原文日文。

²² 關於藍明谷的生平事蹟，詳細請參考藍博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聯合文學，2001），頁237-332。關於鍾浩東生平及「光明報事件」，詳細請參考藍博洲，《愧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51-104。



1937年，台南師範學校時代的藍明谷
(藍明谷家屬提供)。

一篇籲請國府釋放「二二八事件」人犯和消弭本地人和大陸人之間裂痕的「和平宣言」，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藍明谷曾為自己所翻譯的《故鄉》寫了一篇前言〈魯迅之《故鄉》〉，他指出：

我們如果再度回顧「五四」以來的歷史，除了倒在帝國主義「代言人」的封建軍閥凶刀底下的人以外，為數甚多的所謂指導者，或是一些自任為指導者的人，不是中途和敵人妥協，不然就是意氣沮喪，逃往安全地帶。

但是，中途不變節，而且徹底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的人也不是沒有，魯迅即是其中的一人。

不用說，魯迅也是對「五四」以來的中國思想界，相當有影響的人。人人稱呼他是「世界的大文豪」、「青年的導師」

或是「革命的健將」。但是，他不自任為「門陣的戰將」，勿寧自任是「搖旗吶喊的小卒」。而且事實上，他又和所謂的指導者不一樣，直到最後不支倒地的瞬間，他從來沒有停止戰鬥。他不是光站在戰線後方，只是用嘴發號施令的指導者，他與民眾為伍，理解民眾，如同上述所說，是真正與民眾共同戰鬥的「小卒」。他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如果認為老百姓是無知的愚物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他們往往能夠正確的看穿『大人君子』們無法洞察的地方」，這才正是他的文學態度，而且進一步表現在他的生活全般態度，這也是他偉大之所在。

本作寫於1921年1月，和前作《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等相比較，主題不同，手法也不一樣。《風波》之前的作品主題，主要是「暴露」封建社會的弱點。可是，《故鄉》中對於楊二嫂的黑暗面暴露倒是其次，反而將主題放在對淳樸的閩土之同情與深切關懷。在形式上，也一反以前慣有的客觀、諷刺的描寫法，帶有很明顯的抒情色彩。²³

藍明谷的魯迅思想理解，強調魯迅是中國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指導者，而且「與民眾為伍」、「真正與民眾共同戰鬥」，實際參與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藍明谷的魯迅思想理解總括了魯迅的「文學性」、「社會性」與「政治性」，台灣人的魯迅思想理解至此已到達相當高的水準。他甚至將自己所描繪的魯迅

²³ 藍明谷譯，《故鄉》（台北：現代文學研究會，1947），頁3-4，原文日文。

像與自己的人生相互重疊，在國共內戰中，響應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與民眾共同戰鬥」，犧牲了生命。

許壽裳的魯迅思想傳播意圖，是希望能將魯迅思想與戰後台灣的文化重建做一個有機結合，以魯迅思想為媒介，期待在台灣能掀起「新的五四運動」。但是，從大陸來台從事文化重建工作的許壽裳與台灣本地文化人的立場，畢竟是不一樣的。當時台灣人面對的問題不只是文化問題，還包括日漸惡化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龍瑛宗就公開說：

文化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環境與條件，其最低條件之一是什麼呢？那就是文化人生活的安定。如果沒有安定的生活，那就無法從事文化創作。當然文化人是甘於過著清貧生活的，憎惡俗世間的奢侈。然而在現時的社會情勢下，文化人不但不能過著清貧的生活，且會徬徨於餓死線上。文化人不屑投身於貪污行列，在混濁的世界裡也不知「紅包」為何物？在制度與情面的雙重壓迫下，被壓於社會底層，徒然遭受市儈侮蔑，過著呻吟無以為生的可憐生活。²⁴

經歷過殖民地統治下悲哀的台灣人，在戰後初期又要面臨不安定的社會環境，忍受精神上、生活上的諸多困苦。著名文藝評論家山本健吉（1907-1988）曾指出「在亞洲型的規模裡，提供後進國面臨的共同課題之解答時，魯迅文學所蘊含的內涵，能夠

²⁴ 龍瑛宗，〈文化を擁護せよ〉，《中華日報·文藝》，1946年6月22日，原文日文。

給予很多啟發」²⁵。因此，可以理解，在半殖民地狀況下和惡劣環境戰鬥，所產生的魯迅文學和思想，能夠得到台灣人的共鳴，絕對不是偶然的。台灣本地文化人吸收了魯迅思想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戰鬥性」，獲得啟發，反而去思考戰後台灣的現況問題，最後且將魯迅的思想、精神和台灣現狀直接連結，表達他們的不滿。

例如，楊雲萍在〈紀念魯迅〉一文中，就表示：

魯迅生前所憎惡的，似有一部分已經消滅，魯迅生前所爭取的，似有一部分已將見諸實現。

然而，假使我們從興奮裡醒覺，冷靜地思索一下時，那末一定會感覺所謂真理的尊嚴，以及正義的力量，還未完全回復；魯迅所疾惡的「正人君子」，還得意登場，魯迅所痛恨的「英雄豪傑」，還霍霍磨刀，準備著第幾次的大屠殺。而魯迅所最關懷，所最摯愛的我中國民眾，還在過著流離顛沛的慘無天日的生活。至於魯迅盡其一生的血淚，所奮鬥爭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民生」的實現，卻還在遠處的彼岸。

台灣的光復，我們相信地下的魯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只是假使他知道昨今的本省的現狀，不知要作如何感想？我們恐怕他的「欣慰」，將變為哀痛，將變為悲憤了。²⁶

²⁵ 山本健吉，〈魯迅の作品について〉，《魯迅》（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0），頁33。

²⁶ 楊雲萍，〈紀念魯迅〉，頁1。

楊雲萍的文章假託魯迅，實透露了對戰後初期中國、台灣民生疾苦的不滿情緒。

楊逵也在〈阿Q畫圓圈〉一文中，指出：

禮義廉恥之邦，在這一年來給我們看到的，已經欠少了一個信字。……

禮義廉恥之士的靈魂與思想，比不上阿Q的生怕被人笑話，在欠少做人條件的我們看來，卻有點心酸。打倒敵人以來，時間已經過了不短的一年餘了，我們總願結束了一番武劇，來編排一齣建設的新戲，拖來拖去總難得使這個圈畫得圓圓的。我們平民凡夫都是要看看所謂「幸福結尾」的大團圓，一齣劇要演到大團圓，總不得在「路絲腳」的戲台上演，雖有幾個禮義廉恥欠信之士得在此大動亂之下再發其大財，平民凡夫在飢寒交迫之下總會不喜歡他們的。²⁷

楊逵所指的「禮義廉恥之邦」，當然是指中國，而且在動亂中大發其財，使平民凡夫的老百姓陷於飢寒交迫的「禮義廉恥欠信之士」，指的是大陸來台的一部分貪官污吏。他們的靈魂與思想甚至連阿Q都比不上。許壽裳在抗戰勝利後，所企盼的以「愛與誠」重建「新邦」，即使在台灣也絲毫未見實現。

魯迅思想在台灣滲透發展的結果，是台灣本地文化人受到魯迅思想的啟發，藉著紀念魯迅或是透過魯迅的作品討論，激烈的批判大陸來台的一部分國府腐敗官僚，同時也表示對當時中、台

²⁷ 楊逵，〈阿Q畫圓圈〉，《文化交流》第1輯（1947年1月），頁17。

兩地現狀的不滿。許壽裳期待的「新五四運動」並沒有在台灣發生，這種結果也許不是他當初所能預料到的。

三、反魯迅的動態

戰後台灣由上而下的文化重建工作，除了許壽裳的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象徵之一的魯迅思想為核心思想的文化運動外，也有不同方向的文化運動。當時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翼中就公開主張：

我認為台灣文化運動工作仍然缺乏一個領導中心，這不是說台灣的文化運動要加以統制式的領導，而是說當前努力於文化運動的工作者，沒有一個系統的、合理的、一貫的努力方向，也就是說當前努力於文化運動的工作部分中，仍然存留著紛歧錯雜的思想。我們必須要使台灣的文化運動能夠配合建設三民主義新台灣的偉大任務，必須使三民主義能夠成為領導台灣文化運動的最高原則，望著三民主義的最後目標，來致力於台灣文化運動，這就是我們所謂建立台灣文化運動領導中心的意義。²⁸

當時，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台灣省執行委員會）設有「文化運動委員會」，執行文化運動。陳儀當時雖任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掌握行政權與軍

²⁸ 李翼中，〈對當前台灣的文化運動的意見〉，《新生報》，1946年7月28日。

權，卻對台灣省執行委員會絲毫沒有拘束力，甚至有時還受到掣肘。例如，宣傳委員會在檢查電影時，還須會同台灣省執行委員會底下的宣傳處一起審查。眾所皆知，中國國民黨一向是以「黨」治「國」，由黨控制政府。但是，國民黨內部也相當複雜，因意識形態和利害關係分成幾個派系，互相對立、牽制。例如，陳儀即屬於「政學系」，許壽裳在其庇護下進行其文化工作。可是在國民黨本部和國民政府內擁有勢力，負責全國性教育、文化政策的卻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陳果夫，和其弟——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的「CC派」，「政學系」和「CC派」處於對立關係²⁹，許壽裳之前即已與「CC派」處於對立立場³⁰。

台灣甫復歸中國，「CC派」即任命其人員李翼中為台灣省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他隨即組訪問團，在三個月內走遍台灣，於全省的區、鄉、鎮設立台灣省執行委員會下部組織，在縣、市設立「縣市黨務指導辦事處」，指導下部組織。此外，又在台灣省執行委員會之下設立「文化運動委員會」，在全省各地舉辦集會、講演會等文化性活動宣揚三民主義，強調三民主義是戰後台灣最需要注入的新精神，揚言要「黨化新台灣」³¹。「CC派」主導的文化政策經常帶有極端民族主義的傾向，換言之，即是有

²⁹ 詳細請參考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台論〉，收入賴澤涵主編，〈台灣光復初期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³⁰ 許壽裳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清楚的表示反對「CC派」的立場，並透露與「CC派」的對立關係。〈許壽裳日記〉，頁59-60。

³¹ 張光煥（台灣省執行委員會書記長），〈本省黨務概況〉，〈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團刊〉2卷6期（1946年11月15日），頁273-75。伊藤金次郎，〈台灣戦かざるの記〉（東京：明倫閣，1948），頁201-202。

文化保守主義的傾向³²，對於五四學生愛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予以很高評價，但是對於「民主」「科學」——五四啟蒙文化運動則採取保留態度。許壽裳的台灣文化重建構想注定是會和他們產生衝突的。戰後台灣最初攻擊許壽裳和魯迅的文章，即是刊登在國民黨黨部系統的刊物上。

1946年10月是魯迅逝世十週年，當時台灣的報紙、雜誌紛紛製作了魯迅紀念特輯，隔月即出現激烈攻擊許壽裳和魯迅的文章：

許壽裳先生的大作〈魯迅的德行〉，我已經從10月21日的《和平日報》上拜讀了。為了紀念一個死去的朋友而為文表彰，這不僅是一種應酬也是一種美德。不過，恭維死人和恭維活人是一樣的，總要得體。否則便會使人肉麻。許先生說「偉哉魯迅」是可以的，說魯迅是「中國民族之魂」，就似乎有點滑稽。……

許先生說：「他的言滿天下，尊重創造和奮鬥，並且主張擴充文化，指導青年生活，這些都是合於教育的。」許先生是教育家，當然有權這樣說。但是「言滿天下」者很多，不能一律「偉哉」，還得察其「言」是否真正「合於教育」，而且更要「觀其行」。魯迅「奮鬥」的歷史是有過的，「創造」的歷史則無。他「奮鬥」的方法是敷衍與投機。……

許先生又說：「魯迅是一位為民請命，拼命硬幹的人。」

³² 阪口直樹，〈國民黨文化政策の展開と胡適〉，《季刊中國》33號（1993），頁72-82。

民國19年春，[魯迅]忽負密令通緝的罪名，相識的人都勸他暫避。魯迅答道：「不要緊的。」俯仰無怍，處之泰然。許先生竟忘記了魯迅那時候是住在上海租界內的虹口，而且是住在日本的文化間諜內山完造的家裡，……他這樣托庇於民族仇敵的爪牙之下，而你卻說他是「拼命硬幹的人」！……³³

魯迅生前即經常抨擊國民黨，尤其到了晚年，更參與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與運作，該聯盟在精神上是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而且魯迅又公開對結束「長征」後的中國共產黨與紅軍表示敬意，甚至也公開表明支持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由於他晚年這一連串的舉動，所以被尊奉為革命文學家，受到共產黨與激進的知識青年們之禮讚。因此，即使在他去世後，他的存在與思想仍然受到國民黨很大的敵視。

戰後初期，因為陳儀的庇護，所以許壽裳能在台灣公開傳播魯迅的思想，台灣本地文化人也能自由的談論魯迅，至少在表面上，國民黨是不會和許壽裳的活動相對立的。但是，「二二八事件」後，陳儀被調離台灣，隔年，許壽裳又遇害於國立台灣大學宿舍³⁴。其他與魯迅思想傳播有關係的人，如楊逵、藍明谷都遭

³³ 遊客，〈中華民族之魂！〉，《正氣》1卷2期（1946年11月），頁3-4。《正氣》是1946年3月在台北成立的正氣學社之機關刊物，正氣學社的社長是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正氣學社成立之目的是吸收台灣青年加入正氣學社，然後再指導其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或中國國民黨（〈正氣學社三十六年度工作大綱〉，《正氣》1卷4期[1947年1月]，頁78）。故正氣學社很可能就是黨團在台灣的外圍組織。

³⁴ 關於許壽裳的遇害，當時台灣省警務處的正式發表是，1948年2月18日夜，原

遇不幸的命運。1949年，國共鬥爭中失利的國府，終於遷移台灣。它檢討在大陸失敗的原因，其中之一即歸咎於三〇年代的左翼文學³⁵。因此，魯迅的作品在台灣遭到近四十年的禁錮命運。而在同一時期，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給予魯迅極為崇高的評價。

結語

戰後初期，有關台灣文化重建的問題，相當複雜，行政長官公署、國民黨黨部、台灣本地文化人各有各的想法。但是，無庸置疑的，戰後初期，魯迅思想的傳播與閱讀在台灣相當流行，是當時的思想潮流之一，而且與文化重建有關係。

許壽裳擔任行政長官公署底下的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從事台灣文化重建工作，其構想的文化重建便是想藉著魯迅思想的傳播，在台灣掀起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提倡的民主、科學的新精神注入台灣，一掃日本文化思想在台灣社會的影響，達成台灣的文化重建目的。但是，因為發生「二二八事件」、陳儀離職、撤廢編譯館，以魯迅思想為媒介的「新五四運動」並沒有在台灣發生，導致他的構想成為泡影。

另一方面，台灣文化人受到魯迅思想所蘊含的「政治性」與「社會性」之啟發，正視當時台灣的現狀，並透過紀念魯迅的文

編譯館工友高萬偉，潛入許宅欲行竊，被許壽裳發現，故行凶。詳見《新生報》，1948年2月23日。

³⁵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台北：正中，1971），頁467。

章與魯迅的作品討論，抨擊大陸來台的一部分貪官污吏。

此外，以三民主義為核心思想的文化運動也是戰後初期台灣文化重建的另一個方向，這是由國民黨黨部所主導的，其實也正是國府的構想。因此，台灣甫復歸中國，即立刻付諸實行。國府一接收台灣即有意使三民主義——其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official ideology）能成為台灣人國家認同的思想基礎，尤其在台灣人追求自治自主的「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國府將事件發生原因一部分歸咎於共產黨的蠱惑。其後，又發生了台灣人響應共產主義革命的「光明報事件」，國府更加防範共產主義思想在台灣的傳播，當然魯迅思想絕對是在防範之內。早在1946年即已展開的反魯迅動態，就是一個明證。因為魯迅思想在台灣的傳播，有可能導致台灣人反對代表舊中國的國府，而對代表新中國的共產黨政權產生憧憬，甚至進一步產生認同。當時國府要求於台灣人的「國民化」，已不只是一要「中國化」，而且也要「國民黨化」。換句話說，它要求台灣人認同的「國家」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中華民國」，而不是「共產黨統治下的新中國」。這種趨勢，在1949年國府正式遷台之後，更加被強化。饒富意思的是，當時行政長官公署當局、許壽裳負責的台灣省編譯館、行政長官公署外圍團體的台灣文化協進會與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執行委員會，皆高舉著三民主義大旗，齊唱台灣文化改造。但是，彼此間卻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表現了進步對保守的不同立場，這也反映在各自對於戰後台灣文化重建之不同思維上。

第七章

魯迅思想傳播的另一章

——黃榮燦

一、黃榮燦的抵台

本書在上一章已指出魯迅思想在台灣傳播有兩次高潮期，第一次高潮期是在日據時期的一九二〇年代，第二次高潮期則是戰後初期。戰後初期在台灣，魯迅思想主要傳播者，除了許壽裳之外，還有在當時作為魯迅思想傳播者被與許壽裳相提並論的黃榮燦¹。許壽裳認為，戰後台灣的文化重建，要借助魯迅的思想與精神，在台灣掀起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以達成台灣的文化重建工作。而黃榮燦在戰後初期的台灣，系統的、積極的介紹魯迅的木刻思想，換言之，他是戰後台灣第一個魯迅木刻思想的傳播者，而有別於許壽裳，從別的面向來傳播魯迅思想。關於黃榮燦的個人資料，截至九〇年代，所知極為有限，直至近期才逐漸明朗²。本章即是釐清黃榮燦在台傳播魯迅木刻思想的始末，企圖

¹ 姓姓，〈也漫談台灣藝文壇〉，《台灣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頁15。

² 關於黃榮燦的個人資料，1946年12月，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編，開明書店出版，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紀念木刻導師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的《抗戰八年木刻

理解戰後魯迅思想傳播在台灣的另一面向。

黃榮燦，1916年生，四川重慶人，抗日戰爭初期自四川西南職業學校畢業，1938年前往雲南昆明國立藝專學習，1939至1941年任廣西柳州龍城中學美術教師。1938年6月，第一個全國性的木刻團體「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1941年3月，該協會被國民政府社會部指為非法組織，予以解散。1942年1月，該協會改名為「中國木刻研究會」，幾經交涉，終獲認可成立。其後，該研究會又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7月改組為「中華全國木刻協會」。黃榮燦在1941至1943年轉任《柳州日報》副刊〈草原木藝〉編輯，並兼任「中國木刻研究會」柳州分會負

運集)，除了收入黃榮燦的木刻版畫作品「修鐵道」外，關於黃榮燦的介紹是：

重慶人。曾肄業於昆明時期的國立藝專。性好動，善適應環境，熱心木運，富有組織力。抗戰開始後參加劇隊工作，流動於西南諸省。作品多現實生活的描寫。（頁14）

日本有關黃榮燦的介紹，是池田敏雄（1916-1981，台灣民俗學家）的〈敗戰日記〉（《台灣近現代史研究》4號 [1982年10月]，頁55-108）中對黃榮燦所做的註解：

黃榮燦。陶行知的弟子，曾跟魯迅學木刻。據說後來在台灣被處死刑。（頁107，原文日文）

而1985年12月，馬蹄疾、李允經編著，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與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書中列出曾跟隨魯迅學習木刻的青年三十五名，其中沒有黃榮燦的名字。有關黃榮燦的傳記研究，梅丁行，〈黃榮燦疑雲——台灣美術運動的禁區（上）、（中）、（下）〉，《現代美術》67期—69期（1996年8月、10月、12月），做了非常紮實的基礎研究，本文撰寫時獲益不少，梅丁行先生後來也提供一部分寶貴資料給筆者，謹致謝意。

此外，居住於日本福岡的橫地剛先生也在從事黃榮燦的研究，筆者與橫地先生曾交換意見、資料，在此也一致謝意。



黃榮燦20歲左右的照片
(梅丁衍提供)。

責人。1944年，黃榮燦又轉往廣西宜山縣柳慶師範學校任教，同年日軍攻陷宜山，乃返回家鄉重慶。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10月，黃榮燦參加「中國木刻研究會」在重慶舉行的「九人木刻聯展」，這九人除了黃氏以外，還有陳煙橋、梁永泰、王樹藝、王琦、汪刃鋒、陸地、丁正獻、劉峴，皆是活躍於抗日戰爭時期及日後新中國時期的木刻版畫家。當時，新華日報社也提供了一批由延安轉來的木刻版畫與該聯展一起展出，之後，這九人的作品也送往延安展出。同年冬，黃榮燦為教育部赴台教師招聘團所錄用，經香港抵台灣³。因此戰後最早來台的中國木刻版畫家極有可能就是黃榮燦。繼黃榮燦之後，同年又有陳耀寰（廣東人，

³ 梅丁衍，〈黃榮燦疑雲（上）〉，頁49-50。李允經，〈中國現代版畫史〉（太原：山西人民，1996），頁99-109。

1922-), 朱鳴岡(安徽人, 1915-)來台; 1946年, 有荒煙(廣東人, 1921-1989)、麥非(廣東人, 1916-), 陸志庠(江蘇人, 1910-); 1947年, 有王麥稈(山東人, 1912-)、戴英浪(馬來西亞華僑, 1940年返回中國, 1908-1985)、章西崖(浙江人, 1917-); 1948年, 有汪刃鋒(安徽人, 1918-)、黃永玉(湖南人, 1924-)、劉崙(廣東人, 1913-)、陳庭詩(耳氏, 福建人, 1916-2002)。戰後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中國木刻版畫家前來台灣呢? 抗日戰爭勝利後, 中國主流畫家們逐漸回到他們主要的活動舞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美術學校, 然而木刻版畫家大部分都在抗日戰爭時期開始習作木刻版畫, 一面從軍作戰, 一面配合抗日宣傳需要, 結合傳統年畫的技法自學版畫, 發表於報刊、雜誌, 並且以此串聯其他同好。戰爭勝利後, 被國民政府接收復員的地區一時不容許這些木刻版畫家繼續發表作品, 主流美術學校的教席也容納不下他們, 他們喪失活動的舞台後, 於是便前往台灣一探中國新邊疆地區的面貌, 另尋活動空間⁴。黃榮燦也許就在這種心情下前往台灣!

1945年冬, 黃榮燦抵台灣後, 初始並沒有擔任教職, 隨即在1946年1月1日創刊的報紙《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 主編蘇新, 為民間經營的報紙, 1947年3月13日因批評陳儀政府被迫停刊)主編副刊《南虹》⁵, 當時住在台灣的日本僑民還沒有完全

⁴ 謝里法, 〈中國左翼美術在台灣(1945-1949)〉, 《台灣文藝》101期(1986年7、8月), 頁129-56。陸地, 《中國現代版畫史》(北京: 人民美術, 1987), 頁328-30。

⁵ 《人民導報》副刊《南虹》與《人民導報》創刊日同日創刊, 《南虹》主編最初是木馬(本名林金波), 自12期(1月14日)起, 改由黃榮燦主編。

遣送完畢，而且台灣當局也留用了一批日本技術人員與教育人員，黃榮燦以木刻版畫家和《人民導報》副刊主編身分，廣交台灣本地和暫居台灣的日本藝文界人士，特別與蘇新⁶、王白淵⁷、西川滿⁸、濱田隼雄⁹、池田敏雄¹⁰、立石鐵臣¹¹等人來往親密。

黃榮燦抵台後，到底在哪個報社工作，有種種不同的記載，有「上海大導報特派員、人民導報記者」（濱田隼雄，〈黃榮燦君〉，《文化廣場》2卷1號[1947年3月]，頁17；〈木刻畫〉，《展》3號[1982年10月]，頁152），有「前線日報駐台特派員」（池田敏雄，〈敗戰日記〉，頁99），有「大剛報台灣特派員」（吳步乃，〈思想起黃榮燦[續編]〉，《雄獅美術》242期[1991年4月]，頁88）。唯一可以證實的是《人民導報》副刊〈南虹〉，印有「黃榮燦主編」。

⁶ 蘇新（1907-1981），社會運動家。1927年參與台灣共產黨成立工作。1928年，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時，成為正式黨員。1931年，擔任中央常務委員兼書記局長宣傳部長，同年9月被捕，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43年出獄。戰後，任雜誌《政經報》主編，報紙《人民導報》主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逃亡至中國。

⁷ 王白淵（1902-1965），社會運動家、詩人。1925年入學東京美術學校，1932年以因參加過「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系列下的台灣人留學生左翼文化團體「台灣人文化圈」，在岩手女子師範學校任職教師時被捕下獄。其後偷渡上海，任教於上海美術專門學校。1937年，又以抗日分子嫌疑，再度被捕下獄，遣送回台灣。戰後，任《新生報》編譯部主任。

⁸ 西川滿（1908-1999），文學家。1910年全家移住台北，1933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法文科，歸台。1934年，進入台灣日日新報社工作。1939年創立台灣詩人協會，翌年，改組台灣詩人協會為台灣文藝家協會，發行機關刊物《文藝台灣》。1942年，與濱田隼雄、台灣人作家龍瑛宗、張文環一同出席在東京召開的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戰爭期間，西川滿是台灣總督府戰時文藝政策的協助者、執行者。1945年，日本戰敗後，與濱田隼雄被台灣總督府情報課認定是戰時台灣文化的最高指導者，列入戰犯名單提交。1946年4月，被遣返日本。

⁹ 濱田隼雄（1909-1973），文學家。1932年，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國文學科。1933年，任台北私立靜修女學校國語教師。1937年，轉任台北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教師。1938年，結識西川滿，成為知音、文學上的盟友。1942

戰後，西川滿與濱田隼雄設立劇團「制作座」，西川家時常聚集不少前來觀劇的文化人士，黃榮燦也是其中一個。西川滿曾對黃榮燦做了以下的描述：

戰爭以慘敗結束，……一朝破敗的境遇，迫使人們終日為生活奔波，過著天天不關心文化事的日子。出版沒什麼指望。

年，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3年，配合日本戰時國策的創作小說《南方移民村》獲台灣文學賞，同年轉任台北師範學校教授。1945年日本戰敗後，與西川滿同被列為戰犯。1946年4月，被遣返日本。

¹⁰ 池田敏雄（1916-1981），台灣民俗學家。1924年，全家移住台北。1935年，畢業於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於台北龍山公學校，因對台灣民俗極感興趣，戰時致力採集記錄台灣民俗，並參與西川滿創立的台灣詩人協會、台灣文藝家協會。1940年，辭龍山公學校教職，轉任台灣總督府情報部囑託，擔任編輯事務。1941年，在戰爭時期雷厲風行的「皇民化運動」期間，參與雜誌《民俗台灣》的創刊工作，負起企畫、編輯的重任，盡力於保存記錄台灣的民俗。1945年日本戰敗，1946年3月，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留用，同年10月，轉任台灣省編譯館台灣研究組幹事，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後，5月被遣返日本。

¹¹ 立石鐵臣（1905-1980），畫家。1905年生於日本，父親時任台灣總督府財務局事務官，1911年，父親調職日本內地，乃返回日本。1921年，立石鐵臣入門川端畫學校，習日本畫；1926年，轉習西畫，先後師事岸田劉生、梅原龍三郎。1933年1月至3月，赴台寫生。1934年7月至36年3月，再度赴台，活躍台灣藝壇。1939年以後，長居台灣，在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從事標本畫製作。1941年，參與《民俗台灣》的創刊、編輯工作。1942年，擔任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的出版企畫。1945年日本戰敗後，初期繼續留在台北支店工作。1946年被台灣省編譯館台灣研究組留用，任編輯，再度製作標本畫。1947年，該編譯館撤廢後，轉任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美術講師，1948年12月被遣返日本。

於是，我和《文藝台灣》的同仁濱田隼雄商量，創設劇團「制作座」，招集四處遊蕩的文化人來我家。……

超越了語言不通的障礙，觀眾有很多人是來自大陸的中國人。透過這個「制作座」的戲劇，我結交了新的中國友人，他就是來自重慶的黃榮燦先生。

黃先生和郁達夫的妹妹——西畫家郁風女士——一起從事文化工作已經很久了；八年抗戰勝利時，他也同時回到南京，接著轉到上海，然後又渡海到台灣。這位版畫家的作風很踏實，他的人品也讓人如沐春風。

他來我家看過大約兩次「橫丁之圖」第二次公演的舞台排演，對版畫比對戲劇本身有興趣，常常滔滔不絕地談論中國版畫和日本版畫。¹²（原文日文）

黃在西川家結識了濱田隼雄，兩人來往非常頻繁，後來，濱田隼雄寫了下面這段對於黃榮燦的感想：

黃榮燦先生是木刻版畫家。我們第一次見面是終戰那年年末，在西川滿先生家。……

他的名片上印著「上海大導報特派員」和「人民導報記者」兩個頭銜。……終戰後，從中國來的人們多半都說英語，我想他也會說英語，所以努力回想已經忘掉的英語，想得滿頭大汗。而他卻從西裝口袋拿出記事本，開始筆談。……他

¹² 西川滿，〈創作版畫の發祥と終焉——日本領時代の台灣——〉，《アンドロメダ》271號（1992年3月），頁11。

說，中國的新劇運動在抗戰時期也進行得很活絡，最近上海的劇團也計畫來台北。既然戰爭結束了，中日文化的徹底合作就要落實才行。也希望能和日本的劇團共同演出，……還有，他是木刻版畫家，想見見住在台灣的日本畫家，希望我幫他介紹，……他很尊重日本文化人，也很沉著地進行新聞記者的報導工作，和被中國割讓之後的台灣文化層面的調查，以及抗戰中木刻版畫展覽的籌備等文化工作。我的驚訝轉變成羞愧。反省只因為好奇而和他交往的自己，也反省自己的迂腐——嘲笑進駐台灣的軍隊揹著棉被和雨傘的模樣。我在黃君身上看到了中國人，「日本也被中國打敗了」。才第一次具有真實感，震撼了我。¹³（原文日文）

當時，除了西川滿、濱田隼雄以外，還有和黃榮燦以及來台的中國木刻版畫家親密來往的立石鐵臣也留下了珍貴的證言，

終戰後，在本省報上看到兩三幅很優秀的木刻版畫，是同一位作家的作品，在這裡前所未見。魯迅先生孕育、發揚的木刻版畫曾被介紹到日本，不過，這些畫顯然比那些畫的風格更進一步。我想，魯迅先生創造出來的新興木刻版畫，終於在中國開花結果，同時也認為其中一位優秀的木刻版畫家已經來到台灣。

果不其然，我最近終於有機會見到他——黃榮燦先生，我們也互相交談。……黃先生的木刻版畫很細緻，可以說有寫

¹³ 濱田隼雄，〈木刻畫〉，頁153。

實風格。絕不是從中國許多民俗版畫的玩味中衍生出來的，而是走在新中國、有生命力的中國的尖端。雖然他的手法和風格讓人想起蘇俄的木刻版畫，但這種風格才適合新中國的木刻版畫。黃先生等人的木刻版畫的使命和舊文人的喜好無關，它是為了喚醒大眾、教化大眾而誕生的；它的使命不是讓人掛在豪宅牆上欣賞，而是要讓大眾互相傳閱。什麼是新中國最「中國」的心呢？木刻版畫思索著這個課題，在這個課題裡活動；在它這個必然的使命中站著一群年輕的藝術家。所以，它的工作是與大眾同在而不流於媚俗，它的寫實性中有可以淨化大眾的樣式。雖然在寫實性之中有饒舌的說明，但它的作用是為了引領大眾進入版畫世界。

像黃先生這樣的木刻版畫，台灣這邊將會如何傳承？如何發展下去呢？¹⁴（原文日文）

1946年2月，黃榮燦因濱田隼雄的介紹，買下東寧書局的產權¹⁵，改名新創造出版社，計畫創刊文藝美術雜誌《新創造》。黃榮燦買下東寧書局後，為了新創造社的將來計畫、雜誌《新創

¹⁴ 立石鐵臣，〈黃榮燦先生の木刻藝術〉，《人民導報》，1946年3月17日。

¹⁵ 戰前，株式會社三省堂在東京設立子公司東都書籍株式會社，是三省堂出版物的販賣公司。1934年，東京總公司的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在台北設立了分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1945年，日本戰敗後，該支店改名東寧書局。後來因日僑的遣返日本，濱田隼雄從黃榮燦口中得知他有意設立一個中國人、台灣人、日本人畫家、作家能夠交流的沙龍，遂介紹當時還在該支店工作的立石鐵臣，由立石鐵臣仲介，幾經交涉，買下了東寧書局的產權。詳細過程請參考濱田隼雄，〈木刻畫〉，頁156-60。河原功，〈台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日本との文學接點〉（東京：研文出版，1997），頁264-90。

造》的創刊準備工作，一度和池田敏雄密切來往，尋求池田敏雄的合作。當時，池田對他的印象是「黃先生的意見非常進步，經常談論中國最近的民主主義動向（原文日文）」¹⁶。從池田敏雄的日記，我們能夠得知此時黃榮燦與戰前《民俗台灣》的同仁來往頻繁，黃榮燦大概也知道東寧書局的前身是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該支店在戰前得以在台灣確立其出版界的地位，乃是因發行《民俗台灣》，及該雜誌同仁擔任支店的出版顧問、企畫，支撐著該支店。黃榮燦也想借助這批人的力量，好有一番作為，而他確實也留用了《民俗台灣》的同仁，同時也是該支店出版企畫的立石鐵臣。

1946年4月，西川滿、濱田隼雄被遣返日本，同年8月，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紛紛轉往台灣省編譯館工作，之後黃榮燦似乎就很少與日僑來往了。1946年年底，黃榮燦尋求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三聯書店合作，取得該書店負責人之一黃洛峰的同意。黃洛峰從上海派人前往台北協助，並從上海運來進步書刊在新創造出版社販賣。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在風聲鶴唳中，同年11月，新創造出版社結束營業¹⁷。

¹⁶ 池田敏雄，〈敗戰日記〉，頁100。

¹⁷ 詳細請參考曹健飛，〈憶台北新創造出版社〉，《新知書店的戰鬥歷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1994），頁519-22。黃榮燦計畫出版的文藝美術雜誌《新創造》，未見。而新創造出版社計畫出版的圖書，從《人民導報》廣告（1946年5月12日、5月17日）可知有李凌編《新音樂歌選集》、「新創造文藝叢書」——劉白羽《成長》、張天翼《新生》、黃榮燦編《凱綏：珂勒惠支畫集》，以上皆未見。目前，唯一能找到的是新中國劇社發行，新創造出版社總經售，歐陽予倩編劇《桃花扇》，出版日期未註明，但是在封底寫有「本劇於36年（1947）2月15日由新中國劇社在台北中山堂作首次演出」，可推測是

1948年，黃榮燦轉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講師，直至1951年12月，因牽涉吳乃光案被國民政府指為「黃匪早於28年（1939）參加匪幫外圍組織之『木刻協會』，從事反動宣傳，34年（1945）冬潛來台灣，充任《人民導報》畫刊〈南虹〉主編，及新創造出版社社長，與台灣省師範學院講師等職。假文化工作為名，而作反動宣傳之實」¹⁸，遭逮捕以判亂罪起訴，翌年11月，被判處死刑，隔月執行槍決，結束了三十六年短暫的一生，戰後台灣的魯迅思想傳播者又增添了一位犧牲者。

二、黃榮燦的魯迅木刻思想傳播

1945年冬，黃榮燦抵達台灣後，立即展開盛大的文筆活動及木刻版畫創作活動，關於其木刻版畫創作活動，本章不擬探討¹⁹，而把焦點放在他的文筆活動中之魯迅木刻思想傳播。當然其木刻版畫作品，其實也是魯迅木刻思想傳播的一個手段，但是，由於筆者對美術是門外漢，沒有能力來分析這個面向，則有待這方面的專家學者日後來做分析研究。關於黃榮燦在台時期的文筆活動，根據筆者的調查列表如下，

在這段時間前後出版銷售。

¹⁸ 詳細請參考〈吳乃光等叛亂案〉，《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台北：李敖，1991），頁127-29。〈吳乃光案〉，收入呂芳上等訪問，丘慧君紀錄，《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3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1267-278。

¹⁹ 黃榮燦在台發表的木刻版畫作品不下二十件，目錄請參考梅丁衍，〈黃榮燦身世之謎·餘波盪漾〉，《藝術家》48卷3號（1999年3月），頁375-76。

黃榮燦在台灣時期文筆活動年表（1946-1949）（未訂稿）

時間	活動內容
1945年冬 (日期不明)	抵台
1946年1月4日	〈迎一九四六年——願望直前〉，《人民導報·南虹》，2期
1月17日	〈清潔活動〉(署名榮丁)，《人民導報·南虹》，15期
1月22日	〈悼洗星海〉，《人民導報·南虹》，20期
1月27日	〈目的與手段〉(署名榮丁)，《人民導報·南虹》，25期
1月28日	〈從學習說起〉(署名榮丁)，《人民導報·南虹》，26期
1月30日	〈關於「造形藝術」〉，《人民導報·南虹》，28期
1月31日	〈給藝術家以真正的自由——響應廢止危害人民基本自由〉，《人民導報·南虹》，29期
2月8日	〈怎樣利用假期〉(署名榮燦)，《人民導報·南虹》，34期
2月11日	〈婦女要怎求民主〉(署名榮丁)，《人民導報·南虹》，35期
6月2日	〈抗戰中的木刻運動〉，《新生報·星期畫刊》，3期
9月9日	〈歡迎善良的音樂家〉，《人民導報》
9月15日	〈新興木刻藝術在中國〉，《台灣文化》1卷1期
10月6日	〈木刻版畫家A·克拉甫兼珂(1889-1940)(上)〉，《新生報·星期畫刊》，21期
10月20日	〈中國木刻的褌姆——魯迅——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和平日報·每週畫刊》，7期
11月1日	〈悼魯迅先生——他是中國一位新思想家〉，《台灣文化》1卷2期
11月3日	〈木刻版畫家A·克拉甫兼珂(1889-1940)(下)〉，《新生報·星期畫刊》，25期
11月4日	〈馬思聰要離開沙漠〉，《人民導報》
11月9日	〈介紹馬思聰的樂曲〈綏遠組曲〉、〈西藏音詩〉、〈F調協奏曲〉〉，《和平日報·新世紀》，77期
11月10日	〈從葫蘆中壯大〉，《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0期
11月17日	〈創作木刻論〉，《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1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1月24日	〈介紹人民版畫家KAETHE KOLLWITZ 凱綏·珂勒惠支(1867-1945)〉,《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2期
12月1日	〈介紹人民版畫家KAETHE KOLLWITZ 凱綏·珂勒惠支(1867-1945)〉,《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3期
1947年1月1日	〈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1867-1945)〉,《台灣文化》2卷1期
3月1日	〈新現實的美術在中國〉,《台灣文化》2卷3期
8月1日	〈美術教育與社會生活〉,《台灣文化》2卷5期
9月22日	〈法木刻家波耶〉,《中華日報》附刊
10月1日	〈工藝·生活·社會·科學的基礎〉,《台灣文化》2卷7期
1948年3月21日	〈關於學習木藝——介紹陳彙、林亞冠的習作〉,《新生報·畫刊》,9期
3月25日	〈美術家·美術教育——寫於台灣美術節〉,《新生報·美術節特刊》
9月6日	〈凱綏·珂勒惠支〉,《新生報·橋》,161期
11月29日	〈正統美展的厄運——並評三屆「省美展」出品〉,《新生報·橋》,189期
1949年2月8日	〈歌謠舞蹈做中學〉(署名蘇榮燦),《台灣民聲日報·新綠》,139期
4月20日	〈紅頭嶼去來(三)〉(一、二未見),《台旅月刊》1卷3期
4月28日	〈近代名畫與其作家〉,《新生報·集納版》
6月5日	〈濕裝現實的美術——評「台陽美展」〉,《公論報·藝術》,9期
9月17日	〈琉球嶼寫畫記〉(署名黃原),《新生報·藝術生活》,3期
12月10日	〈美展之窗〉(署名黃原),《新生報·藝術生活》,14期

從上述年表中,我們能夠得知從1946年初至1949年底,這四年中黃榮燦一共發表35篇文章,35篇文章中,關於美術者有22篇,而這22篇文章,直接涉及木刻版畫者則占13篇,美術本

刻版畫方面的文章在他的文筆活動中之比例，可謂不少。

1946年，黃榮燦在《人民導報》副刊〈南虹〉1期（1月1日），發表他抵台後的第一件木刻版畫作品〈迎新年舞〉，緊接著在〈南虹〉2期（1月4日），又發表他抵台後第一篇文章〈迎一九四六年——願望直前〉。

在這長春的華麗島上，人民極自然的要迎接五十年受難的新生，都想新的展望比過去更好。那麼就讓我先說我自己。自勝利以來，我就在進行著迎接新的生活，願以八年苦難經歷追奮直前，這是我應有的理由。

我來自祖國的高原，現住海的邊心，就在這陌生的地帶，我外鄉人拿起筆來，寫我所願：我以為我們致力於藝術工作的人，什麼都可以放棄，但不能放棄創作的的生活。我們的心與腦應該承認遠生的偉大是創作，我們青年的朋友也不要失去不可放棄自己願望著的事業，這是偉大生命之源。

抗了八年戰，我們幹藝術工作的，尤其在新興的省都台北，使我想起過去流轉在祖國的生活，在那血的日子裡，用我的工具描寫種種，這種種的描寫中，我最愛那黑與白的分



作 採 榮 燦

(刻木) 舞 年 新 迎

黃榮燦木刻版畫〈迎新年舞〉（原刊《人民導報·南虹》1期，1946年1月1日）。

化（按：指木刻版畫），或愛它是人間的動力；今後我當然不斷的描寫，直到理想為止。……²⁰

上述文章也隱約透露了黃榮燦來台的動機。自抗戰勝利後，和一群活躍於戰爭期間的木刻版畫家一樣，黃榮燦也在「進行著迎接新的生活」，但是國民政府接收復員的地區，容納不了他們的活動空間，但是「致力於藝術工作的人，什麼都可以放棄，但不能放棄創作的的生活」，「新興的省都台北」（台灣）也許還有機會提供他們活動的舞台「不斷的描寫，直到理想為止」。

黃榮燦抵台後也曾公開宣言：

在一個雜亂於私自發展的社會中，藝術家得不到保障與自由，……新的民主國家應賜予藝術家是以他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讓他依照著民主的意旨自由的創造，貢獻於人民社會。……藝術家也可從生活底真實的反映中，幫助新的人類產生新的社會結合的忠實的信念，從此發揮群力消滅那些浮華與自私自利的傢夥，重建一個可愛的康樂之國。²¹

²⁰ 黃榮燦，〈迎一九四六年——願望直前〉，《人民導報·南虹》2期，1946年1月4日。

²¹ 黃榮燦，〈給藝術家以真正的自由——饜應廢止危害人民基本自由〉，《人民導報·南虹》29期，1946年1月31日。黃榮燦在這篇文章結束後，又附加一筆「喜訊：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基本自由。重慶中央社廿八日電：國防最高委員會廿八日晨十時開會，通過認為有關人民基本自由法令之廢止。」由此也可見黃榮燦關心戰後中國民主主義的動向，內心渴望民主之實現。

他內心企盼在「新興的省都台北」（台灣）有中國戰後「民主主義」實現的可能，他認為「今天真正就要來臨的民主勝利已不遠！」²²於是他向台灣青年學生呼籲：

今天台灣的學生所應採取的方向，也就是今天中國廣大人民所努力的方向，用盡全力來爭取「民主」的徹底實現的方向。……放棄小市民的個人主義的觀念，走進廣大人民當中，去為人民服務，建立自己生活的基礎，改進一切落後的統治舊觀念，去把「民主」實現的重任擔負起來，接合國內的學生努力奮進，這是今天台灣學生最正確的方向。²³

同時，也向台灣婦女呼籲：

世界在變，「民主」政治向婦女解放呼響了，目前世界潮流已趨向於真正的「民主」的時候，我們婦女尤其在台灣的婦女應該用全部力量來要求民主。……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婦女才能得到自由和解放，否則永遠沒有平等發展的機會。²⁴

從黃榮燦的發言，正好印證了池田敏雄對他深刻的印象是「黃先生的意見非常進步，經常談論中國最近的民主主義動向」。黃榮

²² 黃榮燦，〈悼洗星海〉，《人民導報·南虹》20期，1946年1月22日。

²³ 榮燦（黃榮燦），〈怎樣利用假期〉，《人民導報·南虹》34期，1946年2月8日。

²⁴ 榮丁（黃榮燦），〈婦女要求民主〉，《人民導報·南虹》35期，1946年2月11日。

燦渴求戰後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希望在台灣掀起一場「邊境革命」，渴望中國戰後「民主主義」至少能夠先在台灣實現，先在台灣「重建一個可愛的康樂之國」，進而推廣全中國。對木刻版畫家黃榮燦而言，能夠作為實現台灣與中國戰後「民主主義」的媒介，就是魯迅木刻思想，此外無他。

黃榮燦抵台後的文筆活動，從前面所列的文筆活動年表，可明顯看出其美術、木刻方面的文章所占之比例是相當高的，而且這些文章幾乎都圍繞在魯迅木刻思想的宣揚。黃榮燦第一篇關於木刻方面的文章，是發表在《新生報》（1945年10月25日創刊，創刊時社長李萬居，當時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機關報）的〈星期畫刊〉3期（1946年6月2日）之〈抗戰中的木刻運動〉。這也是戰後台灣第一篇介紹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文章。黃榮燦在文章中詳細介紹活躍於抗戰中的木刻版畫家——古元、彥涵、李樺、王琦、荒煙、陳煙橋、朱鳴岡、梁永泰、刃鋒、宋秉恆、章西崖等人木刻版畫的特色，同時也介紹發行於抗戰時期的木刻期刊雜誌如《木藝》、《刀與筆》、《木刻通訊》與全國各地的報紙木刻副刊，例如重慶〈半月木刻〉、桂林〈救亡木刻〉、柳州〈草原木刻〉等，黃榮燦在文章中也指出「抗戰八年來，木運的成就還距理想很遠，……然而我們已健壯的起來了，同志們實際的表現突破任何阻礙木運的企圖，這是我們自慰的地方」²⁵。接著，又在

²⁵ 黃榮燦，〈抗戰中的木刻運動〉，《新生報·星期畫刊》3期，1946年6月2日。該期畫刊，除刊載黃榮燦的文章外，還刊載了有李樺的木刻版畫〈兩代〉、彥涵的木刻版畫〈抗戰〉、〈衛生隊在農村〉，古元的木刻版畫〈迎接〉，梁永泰的木刻版畫〈起重機（粵漢路上）〉，麥非的木刻版畫〈崗〉、〈搶運軍糧〉、戰地素描〈警戒線〉、〈檢查〉、〈守望〉、〈喝水〉，張樂平的漫畫〈別

《台灣文化》發表〈新興木刻藝術在中國〉。此文和〈抗戰中的木刻運動〉一樣，都是向台灣介紹新興木刻運動在中國演變的情形。不同的是，在〈新興木刻藝術在中國〉一文中，黃榮燦特別指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十七年來的史實，首始由魯迅先生組織『朝花社』，出版五種外國畫集中除小部分黑白畫外全是木刻，同時又在北平雜誌上介紹德國人民版畫家K·珂羅惠支的木刻『犧牲』，從此播下新的種子」²⁶。在文中，黃榮燦更公開呼籲「今天中國木刻藝術同別的新興藝術運動一樣，要重要[新]建立起來，由反帝、反封建、反侵略以至為爭此民主的前哨」²⁷。黃榮燦心目中理想的木刻運動、木刻宣傳，除了反帝、反封建、反侵略，更是宣揚民主、爭取民主的利器，爭取民主是他來台後文筆活動的一貫基調主張。

1946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日，黃榮燦在《和平日報》（1946年5月4日創刊，屬國民政府國防部，原名《掃蕩報》，總部設在南京，創刊時社長為李上根，1950年7月7日停刊）的〈每週畫刊〉7期「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木刻專輯」²⁸

久重逢），在〈編後語〉註明了「為了使讀者對國內的藝術作家有深一層的認識，從這期起，內容方面，我們打算著重畫和木刻。這裡介紹的幾位作家在國內畫壇上都是素負盛譽的，以後我們想經常的做著這樣的工作，讓本省和內地的藝術互相交流，互相批評，互相進步」。該畫刊的主編是參非。

²⁶ 黃榮燦，〈新興木刻藝術在中國〉，《台灣文化》1卷1期（1946年9月），頁14。

²⁷ 同前註。

²⁸ 該專輯的內容除了黃榮燦的文章外，還有其木刻版畫〈失業工人待救〉、吳忠翰，〈讀《魯迅書簡》後感錄——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而作〉、秉恆的木刻版畫〈鬱悶〉、陳煙橋的木刻版畫〈高爾基與魯迅〉、羅清楨的木刻版畫遺作〈汽油響了〉、野夫的木刻版畫〈安息吧！導師〉、荒煙的木刻版畫〈城堡的克復〉、耳氏的木刻版畫〈母女〉。



魯迅先生遺像
黃榮燦木刻

黃榮燦木刻版畫〈魯迅先生遺像〉
(原刊《和平日報·新世紀》68期，
1946年10月19日)。



黃榮燦木刻版畫〈失業工人待救〉
(原刊《和平日報·每週畫刊》7期，
1946年10月20日)。

(1946年10月20日)，發表該專輯刊頭文章〈中國木刻的褓姆——魯迅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在《台灣文化》1卷2期「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²⁹ (1946年11月1日)發表〈悼魯迅先生——他是中國第一位新思想家〉，另外，在10月19日《和平日報》副刊〈新世紀〉68期也刊登黃榮燦木刻版畫作品〈魯迅先生遺像〉³⁰。在這兩篇文章中，黃榮燦將魯迅的木刻思想更是傳達的淋漓盡致，他指出：

今天在此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較以往有意義，在台灣首次紀念，介紹，認識他，是台灣文化發展重要的一面。

……

魯迅先生把木刻從西歐搬回中國的老家以後，他苦心地哺育著，領導著，它以新的戰鬥姿態配合著現實，關切著民生的命運，而踏上英勇的前進的階段！所以木刻在今天才能刻劃出敵人的野蠻，殘暴，和醜惡的現實來！……

魯迅先生的艱苦的鬥爭精神，我們應該加以充分發揮和強

²⁹ 該特輯的內容除了黃榮燦的文章外，還有楊雲萍，〈紀念魯迅〉、許壽裳，〈魯迅的精神〉、高歌譯，〈斯萊特萊記魯迅〉、陳煙橋，〈魯迅先生與中國新興木刻藝術〉、田漢，〈漫憶魯迅先生〉、雷石榆，〈在台灣首次紀念魯迅先生感言〉、謝似顏輯，〈魯迅舊詩錄〉、凱綏·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畫〈犧牲〉、魯迅的筆跡、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第二次全國木刻展覽會中魯迅先生對青年木刻版畫家談木刻之最後一次攝影照片、魯迅所用之寫字檯的照片。該特輯的主編是蘇新，從〈編後記〉(頁21)得知該特輯的編輯曾得到黃榮燦的協助。

³⁰ 該日副刊的內容，除黃榮燦的木刻版畫外，還有許壽裳，〈魯迅和青年〉、楊遠，〈紀念魯迅〉、胡風，〈關於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穎瑾，〈魯迅先生傳略〉。

調去說明的，所以我們木刻工作者必須盡量地去接受魯迅先生的革命精神，配合著我們的工作——木刻，給現實無情的暴露，和無情的打擊！

我們知道，偉大藝術家是曾經盡過他所應盡的任務，今天，我們也應盡量地去發揮刀筆的威力，去作為祖國爭取民主，搶救危急意旨！³¹

他偉大民主的戰士，通過藝術，與毒龍、瘴煙、黑暗反覆的苦鬥了一生的精力，……他在人類戰勝惡力的巨聲中，擦著歷史的記錄，記錄衝破了「帝國」、「封建」、「侵略」底包圍，終於建立了「不准通過」這永生的號召，團結了民主力量。³²

此外，黃榮燦也陸續在報章介紹了蘇聯木刻版畫家A·克拉甫兼珂與德國女木刻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特別關於凱綏·珂勒惠支的介紹文章，就先後在《和平日報》、《台灣文化》、《新生報》發表了四篇（請參考其文筆活動年表），此外還在《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2期、13期製作了「世界名女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專輯」³³（1946年11月24日、12月1日）。如果說魯迅

³¹ 黃榮燦，〈中國木刻的祿姆——魯迅——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和平日報·每週畫刊》7期，1946年10月20日。

³² 黃榮燦，〈悼魯迅先生——他是中國第一位新思想家〉，《台灣文化》1卷2期（1946年11月），頁13。

³³ 該專輯刊載了黃榮燦〈介紹人民版畫家KAETHE KOLLWITZ凱綏·珂勒惠支（1867-1945）〉，及珂勒惠支木刻版畫作品〈死亡〉、〈母與子〉、〈說話的婦

是第一位把凱綏·珂勒惠支介紹到中國的人，那黃榮燦就是戰後第一位把凱綏·珂勒惠支介紹到台灣的人。眾所皆知，魯迅非常推崇凱綏·珂勒惠支，深受其影響，黃榮燦介紹凱綏·珂勒惠支也等於是在介紹魯迅的木刻思想。在這些文章中，黃也屢屢引用魯迅對珂勒惠支的評語。

提到「婦人為死亡所捕獲」這幅作品，魯迅寫的「『死』從她本身的陰影中出現，由背後來擊她，將她纏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無法叫回他自己的慈愛的母親。一轉眼間，對面就是兩界，『死』是世界上最出眾的拳師，死亡是現社會最動人的悲劇，而這婦人則是全作品中最偉大的一人」。³⁴

黃榮燦同時也在陳述了自己對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的感受「感覺著魯迅對中國人民所抱的感情一樣誠實有力」之後，做了公開呼籲，

中國的新興藝術運動者在今天的「才能就是義務」的凱綏·珂勒惠支的學習是面對著偉大未完成的民族革命的表現，是不許彷徨，至少可以迅速填補才能的義務。凱綏是這

女)、〈產婦)、〈起來鬥爭)、〈追求光明者)、〈婦人為死亡所捕獲)、〈互助)、〈生命前途)、〈在醫生那裡)、〈母親的沉痛)、〈父與子)、〈死)、〈饑餓的孩子們)、〈吊)。

³⁴ 黃榮燦，〈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1867-1945)〉，《台灣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頁11-12。

樣指示了至老不懈的精神留給永生的紀念碑。³⁵

從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理解黃榮燦抵台後，其作為記者的文筆活動，或是一度從事的文化出版活動，企圖創刊美術雜誌，都與作為一個木刻版畫家的思維與活動空間沒有脫節。在戰後的台灣，在國共鬥爭日漸白熱化的氣氛下，他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之內容基調，無非是想追求中國戰後「民主主義」能首先在台灣實現，進而推廣全中國，為達成這個目標，乃積極的傳播魯迅的木刻思想精神，他和魯迅一樣認為木刻版畫對改造人的意識十分強力有效，而魯迅的木刻思想是含有「反帝」、「反封建」、「反侵略」、「爭民主」的因子在內，不只適合中國，也適合戰後的台灣。故黃榮燦積極的介紹魯迅木刻思想，呼籲木刻工作者勿忘魯迅的革命精神，作品中應刻畫醜惡的現實，喚醒民眾爭取民主的精神。

結語

前面也提到黃榮燦的傳記研究，直到最近才有突破性進展。但是，關於黃榮燦研究，還留下不少問題。黃榮燦自1945年底抵台後，一度和木刻版畫家立石鐵臣共同摸索中、日版畫的交流，思索如何展開戰後台灣版畫藝術，立石鐵臣也深刻感受到黃榮燦等一群來自中國的木刻版畫家所抱負的使命是「和舊文人的喜好

³⁵ 黃榮燦，〈介紹人民版畫家KAETHE KOLLWITZ凱琿·珂勒惠支（1867-1945）〉，《和平日報·每週畫刊》12期（1946年11月24日）。

無關，它是為了喚醒大眾、教化大眾而誕生的」，戰後來台的中國木刻版畫家與日本木刻版畫家，如何透過王白淵與台灣本地藝術家進行交流，需要再做更清楚的釐清。而在發生「二二八事件」後，日僑的全部遣送，戰後初期來台的中國木刻版畫家除了黃榮燦、陳庭詩等少數人留下來以外，其餘大都返回中國。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新興木刻藝術之移入台灣也只是曇花一現，更遑論三邊交流。黃榮燦雖閉口不再談魯迅，但在一進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之後，隨即遭遇肅清命運。戰後初期，在台灣宣揚魯迅思想的台灣本地文化人，或大陸來台文化人，沒有人能夠逃離此噩運。